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李源
编

张慰慈卷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李源
编

张慰慈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张慰慈卷/李源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300-20745-2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张慰慈 (1890~1976) -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4078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张慰慈卷

李 源 编

Zhang Weici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 政 编 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31.25 插页 3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01 000		定 价	7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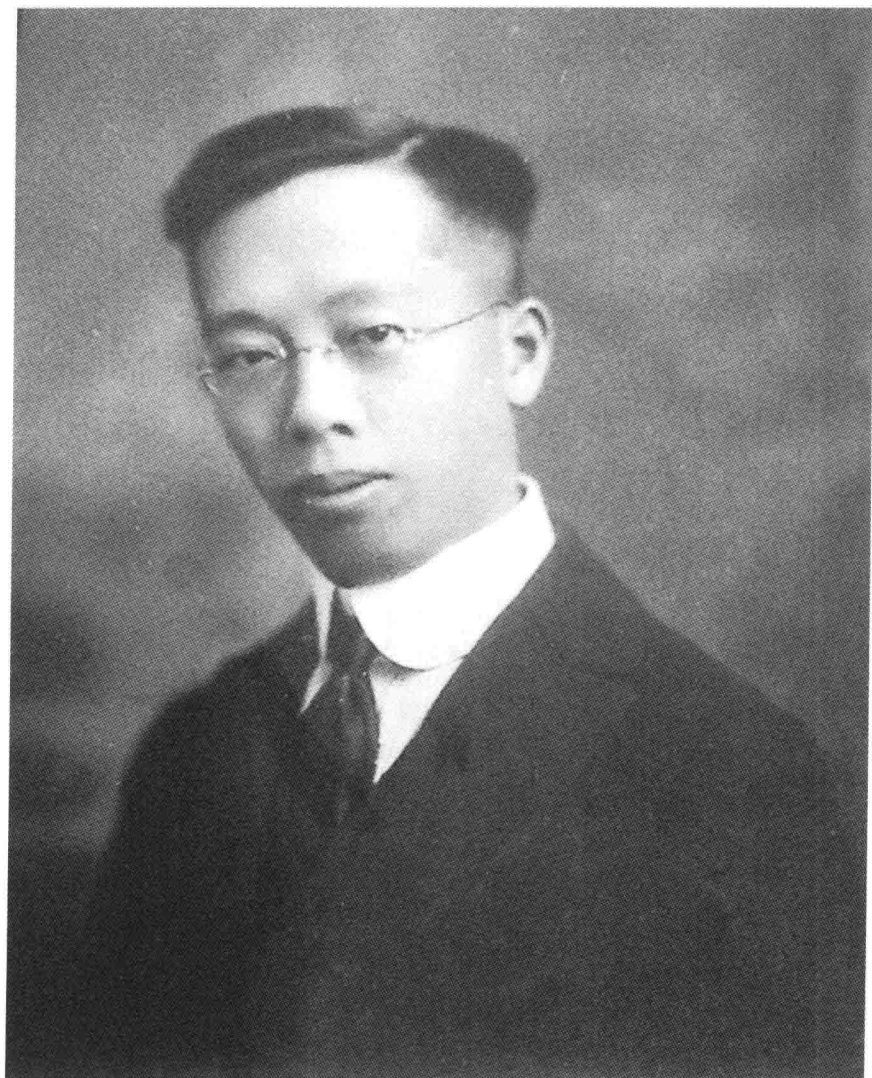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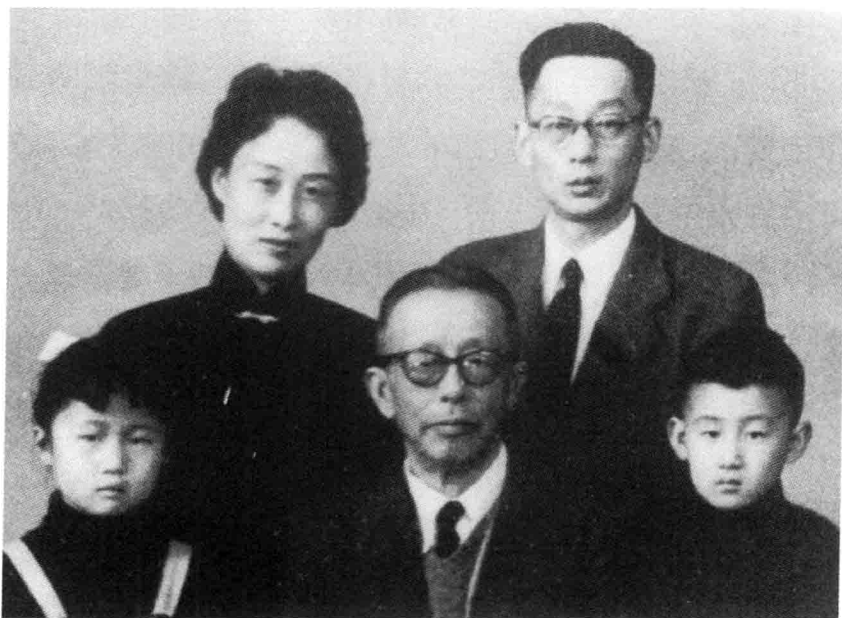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张慰慈像



张慰慈与家人合影（前排左一为张慰慈孙女张旦悦，前排中间为张慰慈，前排右一为张慰慈孙子张旦初，后排左一为张慰慈儿媳瞿鸿琮，后排右一为张慰慈长子张泽群）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 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 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 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 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

导 言

张慰慈（1890—1976），字祖训，江苏吴江人，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政治学家、教育家，同时也是治国专家。

张慰慈早年就读于上海澄衷学堂、复旦公学，后于美国艾奥瓦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法政大学、上海东吴大学法律学院、中国公学政治学教授和安徽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张慰慈所参与教学的主要内容包含政治思想史、法学等社会科学，为社会科学普及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诞生于辛亥革命后，尤其是在 1920 年代的北京大学，当时北京大学的许多教授都是从欧美留学归来的学者专家，包括陶孟和、王世杰、周鲠生、陈启修等人；还有很多人是接受北洋的新式教育，之后在各个大学政治系任教。

从研究阵地看，20 世纪中国政治学的研究阵地在 20 年代主要是北京大学，30 年代主要是清华大学，抗战开始后转移到西南联合大学。张慰慈所主要活动与著述的年代，正是北京大学政治学开创并突飞猛进的时代，张慰慈的主要代表作《政治制度浅说》《政治学大纲》与《宪法》，以及其所翻译的美国政治学家布赖斯的《现代民治政体》，不仅是重要的教学范本，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值得我们今天重新整理与阅读。

张慰慈最主要的著作完成于 1919—1931 年这 13 年间，多是其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编写的著作与教材，其中包括《市政制度》《宪法》《政治学大纲》等开创性研究著作。20 世纪 20 年代的民国政治学大约可以分成几个流派，以胡适及其学术一朋友圈为代表的政治学家群体是自由主义政治学的代表，深受英美政治学传统影响，强调权力分立制衡、契约主权、政党、议会、宪政与国家—社会分立等学说。作为北大政治学

界的代表人物，张慰慈的论著堪称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政治学研究的高峰。

张慰慈是胡适的学人圈子中与胡适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位。十四五岁的时候，张慰慈和胡适就是上海澄衷学堂的同学。张慰慈与胡适始终保持良好的关系，后胡适每次到上海，时常住在上海绍兴路 96 弄的张慰慈家里。

1915 年《青年杂志》创刊（1916 年改名为《新青年》），张慰慈就曾与胡适共同参与，并连载文章。张慰慈曾参与胡适在北京组织的多数重大学术活动，并曾协助胡适创办过大量杂志、刊物。张慰慈性格温和，不爱争强，与胡适的关系始终很融洽。

目前能够搜集到张慰慈最早的一篇理论文章发表在《每周评论》上。《每周评论》由陈独秀、刘半农和张申府合办，作为“不谈政治”的《新青年》关于政论的补充。1920 年胡适接替陈独秀担任过一段时间主笔，这期间张慰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俄国革命，宣扬妇女解放。张慰慈用满怀热情的笔调，介绍俄国革命，同时强调俄国革命对于当时中国社会进行民主实验的重要作用。

后来胡适又创办了《努力周报》，在《努力周报》的主编人员中，除了核心成员胡适、丁文江之外，张慰慈也是重要参与者。《努力周报》是胡适和几位朋友自筹经费所办，不发稿费，写稿、投稿也都是出于友谊，发行部的人也没薪水。在这样的情况下，张慰慈与高一涵也曾任胡适不在京期间担任过一年多的主笔。在此期间张慰慈还积极参与了胡适组织的 20 人茶话会，参与制定了《我们的政治主张》。1923 年胡适南下养病，张慰慈与高一涵成为刊物的主笔，这段时间，胡适与张慰慈、高一涵互通了许多书信，讨论《努力周报》的经费问题。

1923—1925 年间，张慰慈完成了他的几部重要著作：《英国选举制度史》（1923）、《英国政府纲要》（1924）、《市政制度》（1925）。后胡适滞留上海不归，张慰慈与徐志摩等人合办《晨报副刊》，发表了大量关于妇女、婚姻、家庭及批判苏联的文章。张慰慈所发表的关于妇女的文章，引发了热烈讨论。尤其是其所翻译的叔本华的《妇女论》。叔本华对于女权的批判，在欧美学界独树一帜，他对女性存在很多歧视性看法，一直是女权主义者攻击的对象，颇受争议。但其观点尚未引起国内关注。张慰慈译介此篇文章后，引发了大量讨论，也包括谴责，鲁迅先生也曾参与讨论。

张慰慈的《英国选举制度史》与《英国政府纲要》是中国较早系统地介绍英国政府与选举制度的专著。《英国选举制度史》用大量篇幅描述英国选举制度的细节，并分析了英国选举制度的由来与问题，对于今天的英国选举制度研究仍有重要参考价值。《英国政府纲要》更为全面地分析了英国政体的特点，并有大量篇幅描述英国选举制度对于民国政体的借鉴意义。完成这两部经验研究著作，对于张慰慈之后对自由主义政体的判断产生了影响。

《市政制度》是张慰慈的代表作之一。市政研究是民国时期的重要研究领域，当代学界对此已有部分研究，但仍有更多挖掘价值。20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与广东国民政府对于城市改造问题非常重视，因而也使得市政专家能有很多施展才华的空间。相对于30年代的重要市政专家董修甲等人，张慰慈的《市政制度》完成最早，而且其所建立的分析框架，一直为之后的学者沿用。张慰慈不仅强调民治必须从城市市民的自治运动开始，与当时大批主张农村自治的学者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他提出的城市自治的许多具体实践方式，也是同时期研究者根本没有企及的地方。历史经验表明，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要步骤，甚至伴随工业化的进行，实现城镇化是必然结果也是必要条件。张慰慈是中国最早发出城市化先于农村治理呼声的专家学者之一。《市政制度》对于今天我们理解城市化、市政管理，仍有重要意义。

1929—1931年是张慰慈学术的成熟期与总结期，他不仅翻译了布赖斯的《现代民治政体》，也完成了其系统阐释政治思想最重要的三部代表性专著，分别是《宪法》（1930）、《政治制度浅说》（1930）和《政治学大纲》（1930）。这三部著作系统地总结了20年代张慰慈政治思想的精华，是理解张慰慈政治思想最重要的文本。

《宪法》的初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在“小百科系列丛书”之中，共分6章。《政治制度浅说》初版于1930年3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共25章。《政治学大纲》的初版也是完成于1930年，共18章，在《政治制度浅说》基础上，扩增了大量内容，补充进“政治学的性质”“研究政治学的方法”等内容。^①

张慰慈集中出版三部专著，是因为1930年，安徽大学聘任杨亮功为校长。杨亮功上任后，立即在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延聘各领域专

^① 1930年4月，张慰慈合并后两本著作，出版精华本，名为《政治学》，共10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家学者任职，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安徽大学影响力，其中就包括王陆一、张慰慈、丁绪贤等人，此外还延聘了知名学者，包括陆侃如等任各系主任。^①《政治制度浅说》的初稿，张慰慈在北京大学授课期间应该已经基本完成，作为张慰慈在北大授课时所用的教本，借此机遇出版，用于在安徽大学法学院授课。

《政治学大纲》一书是在《政治制度浅说》基础上增订而成，增加了很多对时政问题的讨论。如第11章论宪法，补充第2节“中华民国成文宪法运动史”作结。第15章论政党，补充第2节“中国国民党及其组织”作结。第16章论选举权与罢免权，最后以“选举费用与选举舞弊法律”作结。第18章论“政府职务及其分配”，专门讨论了国民政府的五权宪法。

从《政治学大纲》一书的章节设计与结构中，可以看出张慰慈在这一阶段大量出书，不乏资政之意。1928年6月3日，胡汉民在国民政府结束二次北伐、形式上统一中国前夕，抛出了《训政大纲》，口不离党，明确表示蒋介石应该放下军权，由党来领导军队，同时全国人民接受国民党“训政”。在他看来，国民政府的政权应该完全由国民党把控。胡汉民之所以如此强调党权，是为了与控制军权的蒋介石争夺最高统治权。8月8日，胡汉民将提纲提交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同时到处宣讲，希望国民党代表接受提案。虽然10月3日国民党中央会通过《训政纲领》与《国民政府组织法》，形式上标志“训政阶段”的开始，但是党权与政权谁高谁低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胡汉民所构想出的党统治国家，引领“训政”，主要是希望党的决策通过立法院实现，因而他牢牢握着立法院，希望将立法院凌驾于国民政府之上。而蒋介石和政学系则针锋相对，强调约法高于党权。蒋胡双方明里讨论意识形态，背地里却搞权力斗争，为此引发了学界和政界关于“如何训政”问题的大讨论。

张慰慈出版《政治学大纲》《政治制度浅说》与《宪法》等总结性著作，对于讨论“如何训政”这一问题的意图也十分明显。尤其是在增删《政治制度浅说》基础上完成的《政治学大纲》，有明显的资政之意。他在书中不仅重新梳理了孙中山的“训政”理论，而且试图在蒋胡之争的讨论之外，找到一个新的维度，分析中国到底应该是要“约法之治”

^① 张慰慈后还当过该校图书馆馆长，直到1932年改任国民政府铁道部参事。

还是“党统治国家”的问题。同时，张慰慈这三部著作，也是他在20年代各处发表的文章与论著的总结之作，从三部著作入手，也更有助于理解张慰慈思想的整体脉络。

张慰慈还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治国专家。在北洋政府时期，他就曾参与过许多重要的政治事件。1925年，张慰慈曾作为代表参加过欧洲的国际劳工会议，并针对当时重要的谈判与胡适进行过书信沟通，同时也与教育总长汤尔和、财政总长罗钧任等保持密切联系，还与蔡元培、王宠惠等人联合发表过《争自由的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等自由派学人的重要宣言文章。

从1930年开始，一大批自由派学人，尤其是政治学家纷纷加入蒋介石政府，充当治国专家，利用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治理国家。1932年之后，张慰慈弃学从政，先是南下加入国民政府铁道部，后加入翁文灏的资源委员会，这期间也与胡适在上海有多次会晤。此后张慰慈再未发表过专论或文章，只是与胡适有书信往来。1932年张慰慈还参与创办了中国政治学会，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幕僚。该会是由杭立武、高一涵等人主张，一批政治学家在国民政府之下组织的学术与政治参与并举的机构，也是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学社团。政治学会创始人共有45人，张慰慈名列其中。^①张慰慈连任前几届干事和理事，为政治学会的历届年会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1933年12月开始，张慰慈进入铁道部担任参事，其间到处奔走，疏通铁路事宜。抗战之后，在翁文灏的邀请下，张慰慈加入资源委员会，继续为国民政府做事，奔走于上海、香港、重庆之间，甚至还出行越南和菲律宾。胡适对张慰慈参政非常赞同，多有书信往来。新中国成立后，张慰慈一直从事出版文化工作，为新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

在民国政治学家群体中，张慰慈的政治学研究起步相对较早，且成果极为丰富，在自由主义政治学的谱系中一度扮演了领军人物的角色。由于张慰慈的政治学研究专攻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相较于同时期自由派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别具特色，在讨论具体问题时常提出很不同的见解。张慰慈更兼有治国专家的经验，深入理解其政治学研究中的政治思

^① 关于中国政治学会的研究，具体细节见魏镛：《中国政治学会之成立及其初期学术活动》，载《政治学报》（台北），1992（20）；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28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想价值，有助于我们在传统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研究领域获得新的视角，发现新的问题。

除了著作之外，张慰慈发表的大量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张慰慈的文章所涉及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市政研究、政体研究与时政评论。

张慰慈的市政研究文章多发表在《新青年》《东方杂志》《努力周报》等当时颇有影响力的杂志上，有很大一部分收录在《市政制度》一书之中。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市政府，十分重视城市规划，其中大量成果与当时的市政专家群体建言献策有很大关系。张慰慈在美国期间参阅了大量关于欧美尤其是美国城市化的文章，他的研究多建立在扎实的经验研究之上。张慰慈较为欣赏美国城市化的进程，尤其对于市民自治情有独钟。在其看来，美国公民之所以能有强大的自治习惯与能力，和他们较早城市化有关；而美国城市发展能够如此迅速、高效，也与城市自治传统有密切关系。美国市民有能力自发组织抵制、罢工等社会运动，这在他看来，是中国时下所缺少的。

张慰慈身在北京，对于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十分恐惧，认为革命将会造成流血牺牲与“革命恐怖”。在其看来，缺少具有自治能力的中间阶层，是中国与俄国这些专制国家在危急关头时常发生革命的重要原因。俄国由于贵族阶层和资产阶级较为软弱，才会引发革命。而早已结束了皇权的中国，时下也缺少一个具备自治能力的中间阶层，因而不足以抵抗“赤化”。这种观点在当时北京的知识分子中间也颇有响应。胡适也曾因此与他在书信中有热烈讨论。

张慰慈的市政研究同时也涉及大量的细节与案例。在张慰慈看来，城市自治过程中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有智识的市民；第二，适用的市公约；第三，有统系的行政组织。针对每一项，他都有专门文章讨论。尤其是关于欧美自治城市约章的研究，在民国学界当中并不多见，研究价值很高。城市自治是欧洲自中世纪以来就有的传统，对此当时的学术界研究者并不多。张慰慈曾系统地梳理欧洲城市自治运动与美国城市约章的历史，对于今天的中国也有参考价值。胡适也十分重视张慰慈的市政研究，亲自为《市政制度》作序。

张慰慈关于政体的研究涉及他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理解，也包含他对于时局的理解。在1927年之前，张慰慈的政体研究多涉及东欧和俄国。在其看来，革命政体是一次重要的政治实验，中国缺少这样的政治实